

论南洋华人精英的跨国婚姻——以林文庆、伍连德为例

On Transnational Marriages Among the Nanyang Elites— Case Study on Lim Boon Keng and Wu Lien-teh

林 澜*
(LIN Lan)

李 莹**
(LI Ying)

摘要

本文梳理、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中期海峡华人代表人物林文庆、伍连德的跨国婚姻，目的在于了解：一、生于、长于英属殖民地，接受现代西方教育的华人精英是如何择偶的？二、中国女子嫁给南洋华人后的生活如何？在分析了南洋华人精英的跨国姻缘、他们娶自中国的妻子的家庭和教育背景以及他们的婚后生活之后，本研究认为：一、南洋海归华人精英林文庆、伍连德等倡导进行社会改良，自己也是自觉的实践者。与当时的中国相比，彼时的南洋，给了海归华人精英一个宽松的环境，他们可以比较自由地选择自己理想的配偶。二、从清末至民国，基督教网络对华人华侨与中国建立联系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这一网络帮助南洋华人与中国女性组建婚姻、帮助他们通过基督教徒建立的机构构建他们在中国的人际与工作关系网络。三、中国女子嫁给南洋华人精英后，无论是在南洋还是在中国，夫妻彼此扶持，相互受益。

关键词：南洋华人精英、跨国婚姻、林文庆、伍连德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ransnational marriage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Chinese elites between the late 19th and mid-20th century to find out: how did the Chinese elites who were born and raised in British colonies and had received Western modern education select their spouses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what kind of life did the Chinese women have after they married their Southeast Asian (Nanyang) Chinese husbands? By analyzing the transnational marriages of the Nanyang Chinese elites, the family

* 林澜 北部湾大学国际教育与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马来亚大学人文学院在读博士。电邮地址：linlan@bbgu.edu.cn

** 李莹 北部湾大学国际教育与外国语学院讲师，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在读博士。电邮地址：lying@bbgu.edu.cn

本文为2021年广西社科界智库重点课题(高等院校外语教学研究专项)立项“基于东盟‘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大学英语‘国际素养类’后续课程体系建设与实践”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号：zkzdkw08；广西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高等教育国际化专项课题“来华留学生德育教育话语及其传播效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号：2021ZJY1623。

and education background of their wives from China, and their lives after marriage, this study has drawn three conclusions: 1) The repatriated Nanyang Chinese elites such as Lim Boon Keng, Wu Lien-teh, and others had advocated social improvement, and they themselves were self-conscious practitioners. Compared with China at that time, Nanyang had provided a freer environment for overseas Chinese elites to select their ideal spouses. 2)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Christian network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stablishing ties between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China. This network helped the Nanyang Chinese marry Chinese women and helped them build their inter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networks in China through institutions established by Christians. 3) For most Chinese women and their Nanyang Chinese husbands, they had supported each other and benefited from each other, both in Nanyang and in China.

Keywords: Nanyang elites, transnational marriage, Lim Boon Keng, Wu Lien-teh

一、引言

活跃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历史舞台上的南洋华人精英里，“海峡华人”（Straits Chinese）是不可忽略的部分。海峡华人男性俗称“峇峇”（Baba），女性称“娘惹”（Nyonya），是中国移民与马来亚当地土著的混血后裔。他们的祖辈约于14、15世纪从中国南来马来半岛，第一代与当地土著妇女结合，繁衍生息，生活上逐渐吸收土著的语言、服饰、食物和习惯。19世纪初英国开辟新加坡后，马六甲和檳城的峇峇先后移入。1826年，英国将新加坡、檳城和马六甲并为“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峇峇从此又被称为“海峡华人”（李元瑾，2014）。

当时，峇峇社会流行在本群体内非同姓间联姻，增强了峇峇内部的凝聚力，形成一个紧密的社会结构。在移民潮涌的年代，大批下南洋的中国男子，在本地华人女性奇缺的情况下，纷纷“进赘”（Chin Choay）到峇峇家庭，从此过峇峇生活。换言之，峇峇社会主要是通过婚姻控制，维持他们小社会的完整与繁衍（黄慧敏 2017：319）。

英国殖民时期，峇峇有机会和英国人接触，加上殖民化英语教育的结果，峇峇凭着掌握巫、英双语的能力，以及了解马来半岛社会文化的优势，成了欧洲商人与内陆原住民之间通商的中介。至19世纪末，峇峇几乎掌控了整个海峡殖民地的地方贸易，其经济势力甚至延展至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地区¹（黄慧敏 2017：316）。与此同时，出于对体面的渴求，以及双重身份和双向效忠带来的紧张，使得海峡华人文人如林文庆等竭尽全力进行本地海峡华人社会的改革，尤其要改革偶像崇拜和其他迷信行为（Mark，2003）。而女性海峡华人娘惹，在改革前，鲜少有机会接受学校教育，出嫁前只能待在家里，向女性长辈学习女红和烹饪，出嫁后以操持家务为主，与中国传统的女性差不多。在此背景下，海峡华人知识分子意识到华人妇女的恶劣处境，认为华人妇女“无知”“依赖”“不自由”，并试图改变妇女的落后状态（范若兰 2015：166）。

¹ 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于1896年成立，统辖地区包括了霹雳（Perak）、雪兰莪（Selangor）、森美兰（Negeri Sembilan）及彭亨（Pahang）四州。

南洋华人精英的婚姻生活不是一个很受关注的内容，到目前为止，对此有所探究的主要有李元瑾，她对南洋华人精英代表林文庆、宋旺相和邱菽园的婚姻生活进行研究后认为，人物的出身和教育影响对配偶的选择，人物的文化背景和个人性格影响其爱情观念，三人配偶的语言文化背景以及三人的爱情生活方式让人看到三种不同的文化和思想面貌（李元瑾，2001）。基于此，本文尝试研究海峡华人精英代表人物的婚姻家庭，目的有二：第一，生于、长于英属殖民地、接受现代西方教育的华人精英是如何择偶的？第二，中国女子嫁给南洋华人后的生活如何？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从一个特定的视角了解当时的南洋与中国的关系，以及晚清民初华人女性移民的生活状态。

二、南洋华人精英的跨国姻缘

本文研究的对象林文庆和伍连德是海峡华人，与当时的海峡华人精英大都迎娶娘惹或者本地华人女性²不同，他们娶的妻子来自中国。当时有的峇峇是因为不接受本地美人不雅的大脚，特地回福州去寻觅因小脚而更有魅力的配偶（伍连德 2011b: 745）。林文庆和伍连德为什么会娶中国女性？在峇峇几乎掌控了整个海峡殖民地的地方贸易的时代，峇峇族群自成一个有别于华人移民和土著的群体，而林文庆和伍连德为第二或第三代峇峇，在婚前与中国的联系并不多，他们与中国女子的跨国姻缘是如何产生的？

（一）儒学运动领袖林文庆娶基督教徒

林文庆（1869-1957）是新加坡及中国推动社会和教育改革的医师，是十九世纪末新马地区儒教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大学校长和教育家。其婚姻生活由两段姻缘组成，前后迎娶的两位妻子都是中国女子，一为福州黄端琼，一为厦门殷碧霞。

林文庆1893年留英返新时24岁，作为一名青年才俊，要娶妻并非难事，但刚开始他对做媒的万般推脱，说自己将为东西南北之人，何以家为？继而又自比梁鸿，说世上没有孟光，似乎新加坡的女性不太能符合他的标准，“于环岛之中，而求家人之卦，吾终咏雉朝飞乎”（邱炜菱 2018: 192）。如果邱菽园转述的是林文庆原话或原意，他竟用《雉朝飞》这个咏叹无妻室之典³来表示新加坡岛不可能有他的妻室。林文庆的祖母是檳城娘惹，母亲是马六甲娘惹，他是典型的土生华人。可他没有像当时的峇峇那样，通常迎娶娘惹或本地华人女性，而是两次婚姻都娶了中国的女基督徒。有学者认为他不欢迎异族通婚，是“向世人宣示着他一心向华、决心回归中国的决心”（严春宝 2010: 288）。然林文庆作为一个峇峇，与娘惹通婚并非是与异族通婚，

² 如宋旺相、陈齐贤、李浚源等与林文庆有一定关系的峇峇娶的或是娘惹或者本地华人女子。

³ 参见（清）黄中松，〈诗疑辨证〉卷二，《钦定四库全书》文渊阁藏，第9b页：棣子七十无妻作雉朝飞操曰嗟我虽人曾不如彼雉鸡。以及（清）陈厚耀〈春秋战国异辞〉卷三十九，《钦定四库全书》文渊阁藏，第9b页：雉朝飞者齐宣王时处士牧棣子所作也年七十无妻出薪于野见雉雌雄相随而心悲乃仰天叹曰圣王在上恩及草木鸟兽而我独以不获援琴而歌以自伤曰雉朝飞兮鸣相和雌雄群游于山阿我独何命兮未有家时将暮兮可奈何嗟嗟暮兮可奈何。

相反，与非土生华人通婚才是。他与第一任妻子黄端琼联姻据说是经朋友介绍，“久之始得”（邱炜菱 2018：192），他接受黄端琼为妻，说明黄是他眼中的孟光。他的知己宋旺相、邱菽园对黄端琼的评价也很高，赞其“优雅”“有见识”“受过良好教育”，是“中国奇女子”，且她是卫理公会教徒，深受其他教徒的喜爱和景仰（邱炜菱 2018：192；Song 1923：236-237）。甚至李鸿章在回国的船上遇到跟随老师旅美返回的黄端琼，也对她印象极佳，请她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出席世界妇女大会（邱炜菱 2018：192；严春宝 2010：288）。

但其实，林黄二人婚前经历过一点波折。黄端琼之父黄乃裳在1895年8月为她南下新加坡择婿，即林文庆。9月4日到新加坡，10日议定婚事。不料在19日，牧师薛承恩之女薛姑娘带着素来关系亲密的黄端琼自行赴美。黄乃裳知道后，“焦灼至不能寝食”，因为“已许小婿于十一月内送女到坡完亲，被薛携去，则所议订诸事，全变其局，非特无以对人，而外议沸腾，不知置九于何地！”⁴黄乃裳说薛女此举无异于“拐骗之所为”。他即时向美国驻福州领事“……申明，请将护照扣留不发”，同时“命薛送长女回家”，后又于1896年2月给美国驻福州领事递交禀帖，请领事大人“迅赐札飭地方官即行严命薛姑娘赶速备资，送琼回家交还于九”，并将婚期延至5月（朱峰，2009），实际上端琼直至9月才返，与林文庆结婚的时间是当年12月。如果黄端琼是去游历学习，做父亲的不会是这种反应。这场波折让我们看到黄乃裳对林文庆高度认可，故七天之内替女儿订婚，计划两个月后完婚。发现女儿被他人带走后不惜翻脸相向——哪怕对方是为自己施洗、培养自己传道的牧师薛承恩之女。林文庆对此波折似乎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一直在等待，从原计划的1895年11月完婚，等到女方提出延至次年5月，最终等到年底才完婚。

林、黄两人于1896年12月29日在新加坡长老会教堂举行婚礼。结婚典礼被《自由西报》（*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在12月30日以“尊敬的林文庆医生之婚礼”（*The Hon'ble Dr. Lim Boon Keng's Wedding*）为题予以报道。报道声称：这是新加坡最有趣的婚礼。接下来介绍林文庆年轻有为，其妻擅英文、通西方礼仪。伴郎陈合盛是富商名流。教堂行婚礼后回到新郎叔叔的住处行中式的拜天地礼。下午又到叔叔乡间的住处接待前来祝贺的客人，席间高朋满座。其中有海峡殖民地的第七任辅政司亚历山大·瑞天咸（*Sir Frank Athelstane Swettenham*）（任期为1899-1903），还有很多华商前来参加婚礼，如余连城、陈若锦等（*The Hon'ble Dr. Lim Boon Keng's Wedding 1896: 2*）。婚礼无疑办得周全、热闹又体面。

黄端琼婚后第九年去世。1908年，厦门港堂会长老之女殷碧霞前往新加坡看望哥哥殷雪村，雪村把妹妹介绍给自己行医的合作伙伴林文庆。两人显然很般配，都才华横溢、思想进步（*Grace Yin Pek-Ha: Pioneering community worker, 2021*），于是在当年4月4日喜结良缘。4月9日、4月18日，《自由西报》（*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Marriage of Dr. Lim Boon Keng 1908: 231*）和新加坡《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先后以“林文庆医生的婚姻”（*Marriage of Dr. Lim Boon Keng*）为题予以报道。婚礼在厦门鼓浪屿的长老会教堂举办，伦敦传道会的山雅各（*J. Sadler*）

⁴ 九指九美，为黄乃裳原名之一——本文作者注。

牧师为他们主持教堂婚礼。因为林文庆是英国子民，时任英国领事馆领事的巴特勒（P. O'Brien-Butler）先生为他们在领事馆主持结婚仪式。伴郎兰金先生（H. F. Rankin）是厦门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Amoy）的校长，伴娘是他的千金玛吉（Maggie Rankin），兰金太太也陪伴新娘左右。下午接待客人的地方定在新娘的母亲家（Marriage of Dr. Lim Boon Keng 1908: 7）。这也是一场周全、热闹、体面的婚礼。

林文庆娶了基督徒家的千金，他自己却从1894年始已为孔教奔走演讲（李元瑾 2001: 125），而且，他在谈论儒教时，往往拿它与基督教进行比较，贬抑基督教、褒扬孔教。1895、1896年后，林文庆的言行已留给一种反基督教的印象。《马来西亚信息》评论道：“众所周知，他近年一直积极地反基督教信仰”（李元瑾 2001: 269, 270）。他的褒儒贬基引起英人基督徒的不满。从1895年到1910年之间，双方展开一场长达十六年的儒教与基督教的辩论（李元瑾 2001: 264, 358）。他对基督教批评得非常尖锐，认为基督教不合科学、不合道理、不和道德、不和人情；抨击基督教徒的好斗好战行为，指出基督教徒在非洲和远东各地进行的掠夺战争自我暴露了欧洲人野兽般的素质和欧洲文明的低劣性；还认为：“基督教的输入对中国没有好处……基督教对欧洲的贡献也很小……”（李元瑾 2001: 268, 269）林文庆第一任和第二任夫人无疑都目睹了他与基督教徒的辩论。不过，林文庆通过对西方文化尤其是对基督教文明的批判，逐步勾画出他理想中的儒家学说体系的大体轮廓（严春宝 2017: 83），这可能才是他的初衷。

（二）西医伍连德娶“平妻”

伍连德（1879-1960），著名医学家、公共卫生学家，检疫与防疫事业的先驱，为中国的现代医学建设与医学教育、公共卫生和传染病学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一生也有两段婚姻，第一个夫人是黄乃裳的女儿黄淑琼，第二个夫人（亦称为平妻）是李淑贞。

伍连德于1903年9月最后一天由英国剑桥大学学成归来抵达新加坡，10月7日离新返回槟城他父母的家，短短7天的时间，他在新加坡林文庆家邂逅林的妻妹黄淑琼，二人就订了婚（伍连德 2011a: 277）——实际上当时还有两位华人精英也在追求淑琼，一为宋旺相，另一为陈武烈（伍连德 2011b: 740, 741）。前者是第一个踏入剑桥唐宁学院的华人，也是第一批获得律师资格的海峡华人。1893年返回新加坡，开始担任华人基督教协会（Chinese Christian Association）主席，1894年与别人合开律师馆，1902年获得英国参加爱德华七世加冕典礼的殊荣，1897年-1907年与林文庆合编《海峡华人杂志》。陈武烈是陈金钟之孙，19世纪末，23岁的他已是福建帮的主要领导人物。1899年，新加坡女子学校（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创办，他任财政（柯木林 2016: 348）。而伍连德才刚博士毕业。淑琼选择伍连德的原因是她与姐姐端琼“不想寻求豪门望族或大财主”（伍连德 2011b: 740）。如果说伍连德第一个妻子是通过姻亲关系娶到的，他与第二个妻子或许是因为同乡关系而结缘。伍连德常年在东北抗疫，他把身体不佳的黄淑琼安置在北京。1925年，伍连德与淑琼的次子长福在北京病故，伍连德实在太需要身边有人安慰和照顾，于是他娶了平妻李淑贞，其父母原籍广东新会，其本人生于吉林省——伍连德祖籍也是新会。

伍连德、林文庆都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都通过基督教构建家庭或工作的网络。伍连德对身为基督徒的黄淑琼情深义切，关怀备至。他也通过只吸收基督徒为会员的中国博医会构建他在中国的人际与医药关系网络（陈雪薇 2014：64）。林文庆通过基督教的关系网收获了两度跨国婚姻。他的两次婚礼都是在长老会教堂举办，恐怕并非事出偶然——他是爱丁堡大学的毕业生，爱丁堡是苏格兰首府，而苏格兰长老会是苏格兰名义上的国教。因此，林文庆与长老会可能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林文庆的岳父黄乃裳青年时期即入基督教美以美会，黄氏姐妹的生母谢氏毕业于公理会保福山女子中学（詹冠群 1992：17）。黄端琼生于1874年，淑琼生于1882年，两姐妹都在传教士的陪伴下长大。殷碧霞父亲为厦门港堂会长老。殷碧霞生于1884年，她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毕业后任教于女校。这三位女性结婚时分别是22岁、23岁、24岁，在当时都属大龄青年。在清末的中国，信异教，到洋人学校读书的女子，想是不易寻得夫婿。而接受了西方教育、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海峡华人，则愿意选择受西洋文化影响的女子为偶。

三、来自中国的妻子的家庭、教育背景

黄氏姐妹之父黄乃裳青年时期受洗信教后供职于基督教美以美会，娶妻谢氏，乃卒业于公理会保福山女子中学⁵，婚后即于家中设立初级女塾（刘子政 1991：103）。黄端琼和黄淑琼生长在一个基督教氛围甚为浓厚的家庭，姐姐与传教士薛承恩之女有师生之谊，关系亲密。妹妹在母逝时才8岁，美国卫理公会传道会的博纳菲尔德（Julia Bonafield）小姐是她的美国教师和养母，长期陪伴她（伍连德 2011b：741，753）。黄乃裳出身于贫穷的农民家庭，供职基督教美以美会后经济条件才有好转，但也并没有大富大贵。他与原配和续弦先后生育七子四女。让两个年长的女儿跟着教会的女性生活，接受教会的教育，是最好的选择。

淑琼远嫁到槟城时，女性亲友到婚房翻箱倒柜却只“找到十来套衣服和两瓶法国香水而已。在梳妆台上，摆着几件福州出产的漆器，里面装着中国制造的搽脸香粉，几张专用做口红的红纸。”新娘子的装扮是这样的：“黑色长发……梳往头顶挽成一个简单的发髻，用几个黑色发卡固定，并没有常见的那些大型的耀眼金质或钻石头饰。”“她的腿上穿有中国出产的长筒丝袜，脚上穿着一双家制的粉色缎面鞋。”（伍连德 2011a：292，293）这只能说是普通家庭嫁女的阵仗了。

伍连德因为妻子的缘故，对中国传统女性成长过程的合理性、对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产生了质疑，他在《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以下简称为《自述》）中如此写道：

⁵ 1853年由美国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 1824-1880）创办，初名美部会妇女学校，教会派女传教士唐师姑主持校政。办学初期，一般人家不让女孩子上学堂读书，女校就以孤女、贫苦人家女儿为招生对象，免费入学，生活给予照顾。学生称“姑娘妹”，废除缠足，住校学习，课程以圣经为主，兼学算术和自然常识。参见：维基百科——私立文山女子中学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81%E7%AB%8B%E6%96%87%E5%B1%B1%E5%A5%B3%E5%AD%90%E4%B8%AD%E5%AD%A6>。

她⁶在一个保守的学者家庭的深闺中长大，耳濡目染的是儒家传统的孝道、严格的家教与闺训，她坐着无靠背的凳子，伏在桌子上连续学习几个小时，还要随时照料严厉的父亲，为他端茶送水或找出他想要的书，形如婢女。因此，根据现代标准，可以认为她求学和青少年时期的生活都是有损健康的。我了解到，露芙⁷还是个不满六岁的孩子时，便遵从当时上流家庭的要求缠足，以便使她有朝一日出脱成那个时代的时髦姑娘，即走起路来必须像“婀娜多姿的百合花”。（伍连德 2011b: 744, 745）

据伍连德所说，姐姐端琼也和淑琼一样，由父亲管教，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正规教育，或许她们为此付出了个人健康作为代价。她们的母亲虽在教会学校毕业，却一生缠足。伍连德并说，幸亏其父后来信奉基督教，才解放了淑琼的双脚（伍连德 2011b: 744, 745, 749）。但事实上黄乃裳结婚前就已经受洗信教，1875年还与保灵夫人合著《革除缠足论》等刊登诸报（詹冠群 1992: 212-213），故而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福建当时缠足风气太盛（Gates, 2001），除非农民子女要干重活，其他家庭，尤其是上层社会的女孩都要缠足（冯尔康 1990: 348-349）。小脚女性才符合中国男性社会理想的淑女标准，哪怕是生活在一个双亲信教、往来皆教徒的环境。所以淑琼在教会学校读书时，与同学调皮捣蛋的行为之一就是晚上把已经解放的脚又裹上，跟老师作对，或者认为裹脚才能获得如意郎君（伍连德 2011b: 745）。这些事情说明裹脚风气在中国人的家庭根深蒂固，说明姐妹俩成长的环境并非想象的那么开明。

但是，同在福建的厦门女子殷碧霞的生活却截然不同。殷家祖籍江苏常州，殷碧霞的父亲殷荣康早年移居厦门，成为厦门港堂会长老，创办“厦港锻造厂”和“荣康小学”，其妻吴淑懿为俄籍犹太人。家里共有儿女七个，殷碧霞是最小的孩子。其父母都具有改革思想，呼吁女子接受教育，主张废除中国妇女缠足的陋习，反对奴隶买卖。所以，1884年出生于鼓浪屿的殷碧霞，8岁入怀仁女学，14岁就读漳州中西学堂，16岁入福州美以美教会英文女学，毕业后任厦门女子高等学校英文教师。成为当时厦门第一位执掌教鞭的女教师——虽然当时厦门仍有溺毙女婴陋习（陈煜，2020）。

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人们都在探寻中国走向开放、走向现代的路径，基督教的传播无疑也是当时的途径之一。林文庆、伍连德的三位教徒妻子，生于基督教家庭，在基督教的环境耳濡目染，成长并接受教育，通过加入教会，参与教会的活动，培养出了一定的自我意识，学会了担当社会责任，并构建了社会网络，也为她们出嫁后能各有所为奠定了基础。

四、婚后的生活

迎娶中国妻子的回报其实是很不错的。嫁到新加坡的黄端琼在新的生活非常繁忙。自1987年至1905年病逝，她与林文庆生育了四儿，还有两女（严春宝 2010: 279）。

⁶ 指妻子黄淑琼。——笔者注。

⁷ 黄淑琼英文名为露芙。——笔者注。

期间的1899年，她到丈夫创办的新加坡女子学校任教，坚持每星期给学生上两次中文课（严春宝 2010：277），还为海峡殖民地总督的夫人米切尔女士⁸做过许多事（伍连德 2011a：277）。此外，身体虚弱的她还要为丈夫担惊受怕。1903年，她听到传言说陪同肃亲王儿子到北京的丈夫已遇害，病情恶化，两年后病逝（李元瑾 2001：46）。

殷碧霞的家庭在厦门是名门望族。生于鼓浪屿的殷碧霞先后就读漳州中西学堂、福州美以美教会英文女学等，毕业后任厦门女子高等学校英文教师，成为厦门第一位女教师（陈煜，2020）。婚后，殷碧霞迁至新加坡，在新加坡大显身手，投身于社会活动。她与李浚源夫人陈德娘等人于1915年一起创建了新加坡华人妇女协会（The Chinese Ladies' Association），积极组织各种活动为慈善事业筹款（Grace Yin Pek-Ha: Pioneering community worker, 2021）。1931年被推选为新加坡华人妇女协会会长，发起创办了华人孤儿院，并兼任首任院长。同年，海峡殖民政府委任殷碧霞为监狱视察员和青年犯罪法庭顾问，是新马华人妇女中第一位担任此职的人，1948年受封为太平局绅（陈煜，2020；Yu, 2016）。与此同时，殷碧霞还投身于厦门的社会慈善活动。1913年她在厦门倡办养老院收养孤寡老人，成立保良所解救婢女。1930年担任厦门养老院院长与保良所所长（陈煜，2020；Yu, 2016）。可见她是个跨域的社会活动家。

殷碧霞也是一个跨文化、用双语的才女。婚后第二年，她在《海峡华人年刊》（*Straits Chinese Annual*）用英文发表了短文《鼓浪屿》（Kulangsu），向世人介绍这座美丽的小岛，表达对故国家园的眷恋（陈煜 2006：17）。1929年，林文庆的《离骚》英译本出版，里面附有她编写的词汇表（National Library Singapore 2020: 115; Qu Yuan, 2021: 34），足见其中文古文及英文功底之扎实，对林文庆的工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给予他切实的支持。

殷碧霞还能够跨越她的阶级界限。她的家庭本是厦门的望族，她与林文庆从1908年4月到1930年4月在鼓浪屿购地置业，在英国驻厦领事馆共登记注册了六处地产，家境非常殷实。但是“二战”后，林文庆经济拮据，在1946年写给孙子林国安的一封信里，他说：“祖母⁹现在做所有的家务。我们没有什么经济来源，所以她得干活了。”¹⁰上了年纪却陷入经济困境，如果女主人不体谅、不能干，这个家很难维持得好。

伍连德黄淑琼二人于1905年7月在新加坡举行婚礼，随后回到槟城。新娘的衣着、语言和气质与槟城的女性不同，她们很赏识新娘的文明品味和优雅风度（伍连德 2011a：292，293）。婚后，淑琼不太适应马来亚湿热的气候，穿不惯本地娘惹的轻便服饰，总希望能回到祖国去，和亲友团聚（伍连德 2011a：309）。1908年5月，伍连德应清朝政府聘请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于是全家返回中国。1911年伍连德将家人安顿在北京。黄淑琼在1906、1909和1911年先后生育三子。她是伍连德“最忠诚的伴侣”，“是一位可敬的贤妻良母”，是伍连德“在北京官场生涯中的贤内助”

⁸ 即米切尔爵士（Sir Charles Bullen Hugh Mitchell）之妻，米切尔爵士于1894年2月1日—1899年12月7日任海峡殖民地总督。

⁹ 即殷碧霞。——作者注。

¹⁰ 原文为：Grandma is doing all the housework. As we are quite without any financial resource she has to work. (Kon 2019: 24)

（伍连德 2011b: 744）。同时，她具有惊人的文学才华，1924至1934年用英文完成了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中三位的撰著，颇为西人推崇。

伍连德与平妻李淑贞育有三女二男。黄淑琼、李淑贞两个妻子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居住，相安无事。黄淑琼在1937年参加完儿子长庚的婚礼不久，便在北平病逝。1937年，伍连德携平妻李淑贞和他们的孩子回到家乡槟榔屿。李淑贞1947年抗战胜利后还陪同丈夫回过中国（伍连德 2011b: 792）。她与伍氏相濡以沫的时间更长，而且死后相伴长眠。

这些娶自中国的妻子除了相夫教子外，还陪丈夫跨国工作、生活，给予南洋丈夫支持和帮助。

林文庆在新加坡华人社会和峇峇社会大力倡导改革，除陋习，兴女学，鼓吹孔教，以建立基于全球共同体视野下进步的海外华人身份，消除双重身份和双向效忠带来的紧张，在新加坡很受认可。但是在中国，他的双重身份和尊孔学说受到质疑。首先是中国文坛领袖鲁迅对他的身份、他的尊孔不以为然。鲁迅说：“校长林文庆博士是英国籍的中国人，开口闭口，不离孔子，曾经做过一本讲孔教的书，可惜名目我忘记了”（鲁迅 2005: 418）。其次，舆论对他的抨击也围绕他的身份和尊孔。1934年，《中国评论周报》第22期的“亲切写真”栏目对他的批评犀利尖刻，说林文庆“既不是医师，也不是学者，既不是商人，也不是教育家。他真正的职业，是努力成名。他想要的，就只是出名。”“你向林医生请教有关孔夫子的问题，他可以讲上个把小时理雅各著作里的陈词滥调”（温源宁 2012: 87）。第三，国民政府对他的评价并不高。1940年，林的身份是侨务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给他的考核成绩很低，只有C+，评语是“係英属华侨，无定见，对本党无认识，与陈嘉庚关系密切”。对于他为厦门大学艰难支撑16年一事，只有如下评语：“以林为实际负责人，惨淡经营，尚有成绩”（黄贤强，2021）。

林文庆为厦大的付出与中国社会对他的反应显然落差很大。所幸的是，殷碧霞婚后频频回鼓浪屿省亲，将林文庆和厦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在鼓浪屿持续而大量地购置地产，以满足殷碧霞亲近家人的愿望，林文庆和前妻生的第三、第四子也都曾任教于厦门大学。同时，林殷二人的土地交易，也得益于在厦门的殷家人的照应。林殷两家联姻，无疑强化了林文庆的海澄原籍观念，并在厦门社会弱化了其海峡土生华人的背景（陈煜，2009；严春宝，2010）。这些对于林文庆多少算是一种安慰。

林文庆在抗战期间及之后的人生与之前的相比出现巨大的落差，殷碧霞陪伴丈夫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日占时期的1942年，因为林文庆积极抗日、也因为要挟他同意出任“华侨协会”会长，日本人强迫殷碧霞跪在烈日下，对她进行折磨（Grace Yin Pek-Ha: *Pioneering community worker*, 2021; Yu, 2016）——为丈夫承受如此的精神和肉体折磨，除了深明大义，还须有情有义。20世纪50年代，林氏夫妇居住在百德申山路（Paterson Hill Road）山顶上的独座房屋，楼上在二战后曾被用作酒吧，招待军人，不知何人在墙上画了端着鸡尾酒杯嬉戏的裸女。后来殷碧霞找来画家给她们添上文胸和内裤，林氏后代猜测，这是因为一生开朗的丈夫一定要保留这些艺术品，而妻子身为基督徒，按理不能容忍如此不雅之事，却也只能采用这样的办法来迁就丈夫（Kon 2019: 6-7）。林文庆去世时，殷碧霞为他行基督教葬礼，声称他临终前皈依基督教。

他们的曾孙女官星波猜测：曾祖母是英国圣公会教徒，她也许觉得唯有成为基督徒，才能免遭地狱之火的折磨。此举出于善意，林文庆应不会有什么怨言¹¹。从这些有限的资料来看，林、殷是一对患难夫妻，殷碧霞对晚景落寞的林文庆表现出了深切的关爱。

伍连德的事业在中国达到了巅峰，但他也有尴尬之处。首先是语言和身份的问题。伍连德说英语、广东话和闽南语，但不会说普通话（陈剑红、黄贤强 2005：11，12；李叔飞，2009），尤其是文言文掌握不好，所以在觐见清廷大臣铁良时几乎闹笑话。后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请了中国教师，让他在最短的时间里能用中国官话进行日常的工作交流，应付门诊和病房中的教学（伍连德 2011a：336，341）。在他1911年遏制了东北鼠疫之后，醇亲王招其进宫觐见，宫内传言他“是来自海外乳臭未干的小伙子，虽然是中国人，但不太会说官话，更谈不上熟悉宫中礼仪了”（伍连德 2011b：350）。此外，更有对他不利的舆论。1934年，伍连德在中国已工作生活了26年，《中国评论周报》第31期的“亲切写真”栏目对他的调侃很不客气，依然认为他与周围格格不入：

听过伍博士大会发言的人也许会记得他是一个枯燥乏味而又令人难忘的演讲者：他的学识都遮掩在陈词滥调里了。在茶会上看到伍博士置身于年轻女士中间的人，则可能认为他娱人乏术、举止笨拙，想要诙谐却显得笨拙，就像一只只点不响的炮仗一样。

（温源宁 2012：117）

夫人黄淑琼为他解决了不少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她通中英文，所以她出席外务部的招待会、英国和美国公使馆的宴会，应酬自如（伍连德 2011a：374），帮助伍连德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尤其在面临重大抉择时，如蒋介石曾欲委任伍连德为国防部军医署署长，淑琼力主他拒绝，伍连德认为她是“最聪明的顾问”（伍连德 2011a：414-415）。伍连德在《自述》中转述淑琼撰著的中国四大美人故事时增添了一些带有个人主观色彩的叙述，如说西施最后投水自尽是“因为她意识到她的计谋给幻灭的国君夫差带来了致命的结果，良心受到自谴”（伍连德 2011b：750），说明淑琼对他传授了不少中华文化知识。

至于第二任妻子李淑贞，伍连德在《自述》中赞许她持家有方，说她身体健康、强壮、适应能力强。日占期间的1943年7月，伍连德在怡保被人绑架，勒索7000元巨款，李淑贞第二天想方设法筹到钱并亲自带着钱到丛林领回丈夫。两个月后，夫妻俩因此事被日本宪兵带去审问。尽管他们很快被释放（伍连德 2011b：767-769），如此事件也足以让任何普通人胆颤心惊。所幸淑贞与伍氏相伴一生，生养的五孩子也有很好的发展，给了伍连德莫大的安慰。

¹¹ 原文为：When Boon Keng died in 1957 his wife Grace gave him a Christian funeral, claiming he had converted on his death-bed. Perhaps from her strict Anglican point of view, he had to become a Christian, to save him from eternal fire...this man...would not have consented to a death-bed conversion. (Kon 2019: 20)

五、结语

本文试析了19世纪末20世纪中期海峡华人精英的婚姻，认为：一、南洋海归华人精英林文庆、伍连德等倡导进行社会改良，自己也是自觉的实践者。他们不像大部分的土生华人，倾向于在峇峇族群内或新加坡岛内寻找伴侣。林、伍这两个南洋华人精英典型选择了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中国基督徒女性为偶。而在中国，诸如鲁迅、胡适、林语堂等后辈海归，都还不得不接受父母包办的婚姻，鲁迅及其原配妻子为此一生痛苦不堪。可以说，彼时的南洋，给了海归华人精英一个宽松的环境，他们可以比较自由地选择自己理想的配偶。二、南洋华人的婚姻，让我们得以一窥彼时南洋与中国的关系。从清末至民国，基督教网络对华人华侨与中国建立联系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这一网络帮助南洋华人与中国女性组建婚姻家庭、帮助他们通过基督徒建立的机构构建他们在中国的人际与工作关系网络。三、从南洋华人精英的妻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华人女性移民的生活状态。以本研究中的两个南洋华人精英为例，他们夫妻彼此扶持，相互受益，无论是在南洋，还是在中国，他们的生活是愉快的，他们的人生是有为的。

参考文献

- Frost, Mark Ravinder 2003. Transcultural diaspora: The Straits Chinese in Singapore, 1819–1918.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No.10, 1-44.
- Gates, H. 2001. Footloose in Fujian: Economic correlates of footbinding,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Gates, 43(1): 130-148.
- Grace Yin Pek-Ha: Pioneering community worker, <https://www.swhf.sg/profiles/grace-yin-pek-ha/>, 2021-10-12.
- Kon, Stella 2019. *Sambal Blachan and Lim Boon Keng*, Singapore: Ethos Books.
- Marriage of Dr. Lim Boon Keng,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Weekly)*, 9 April 1908, p231.
- Marriage of Dr. Lim Boon Keng, *The Straits Times*, 18 April 1908, p7.
- National Library Singapore 2020. *Stories from the Stacks*,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International Asia Pte Ltd.
- Ooi, Yu-lin 2016. Philanthropy in transition: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Asian women and philanthropy in Singapore, 1900-1945. *Philanthropy in Asia: Working Paper*, No.2, 62-64.
- Qu Yuan 2021. *The Li Sao: An Elegy on Encountering Sorrows*. Trans. Lim Boon Keng.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 Song, O. S. 1923.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Chinese in Singapore*, London: John Murray.
- The Hon'ble Dr. Lim Boon Keng's Wedding,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30 December 1896, p2.
- 陈剑红、黄贤强，2005，《槟榔屿华人研究》，韩江学院华人文化馆，页11-12。
- 陈雪薇，2015，《伍连德研究：经验，认同，书写》，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创作室。
- 陈煜，〈鼓浪屿，殷碧霞的心灵家园〉，《厦门晚报》，2006年11月27日，17版。

- 陈煜, 2009, 〈一砖一石乡土情: 解读林文庆在鼓浪屿的购地置业〉, 收录于李元瑾, 《东西穿梭、南北往返: 林文庆的厦大情缘》, 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文化语言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 页87-118。
- 陈煜, 2020, 〈林文庆医生的鼓浪屿情缘〉, 《源》, 第2期, 页20-22。
- 范若兰, 2015, 《东南亚女性的政治参与》,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冯尔康, 1990, 《清人社会生活》,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 黄慧敏, 2017, 〈海门奇葩——峇峇文化〉, 收录于柯木林, 《新加坡华人通史(上册)》,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页313-343。
- 黄贤强, 〈国民政府打分林文庆父子和陈楚楠的考核成绩单〉, 《联合早报》, 2021年5月27日, 2版。
- 柯木林, 2016, 《从龙牙门到新加坡: 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叔飞, 2009, 〈海峡华人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观念——伍连德与林文庆的比较研究〉,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第4期, 页42-51。
- 李元瑾, 2001, 《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 新加坡: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
- 李元瑾, 2009, 《东西穿梭、南北往返: 林文庆的厦大情缘》, 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文化语言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
- 李元瑾, 2014, 〈从文化殖民的视角重读新加坡海峡华人的失根与寻根〉,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第6期, 页15-23。
- 刘子政, 1991, 《黄乃裳与诗巫》,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 鲁迅, 2005, 《鲁迅全集(第三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邱炜菱, 2018, 《菽园赘谈》,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 温源宁, 2012, 《不够知己》,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伍连德, 2011a, 《鼠疫斗士: 伍连德自述(上)》,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 伍连德, 2011b, 《鼠疫斗士: 伍连德自述(下)》,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 严春宝, 2010, 《大学校长林文庆: 一生真伪有谁知》,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 严春宝, 2017, 《他乡的圣人: 林文庆的儒学思想》,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詹冠群, 1992, 《黄乃裳传》,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 朱峰, 2009, 〈黄乃裳《绂丞七十自叙》的考订与补充〉,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2期, 页119-124。